

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担当

核心阅读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项全球性的行动倡议，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所有人享有和平与繁荣。2015年9月，《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联合国大会上由成员国正式通过。该议程包含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子目标和232项具体指标，涵盖了有关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

□ 罗世礼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称《2030年议程》）将指导未来十几年的全球发展重点：我们不仅要努力消除极端贫困，还要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和更具韧性的未来。

中国致力于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社会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把解决国内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他的报告指出，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已成为人们过上更美好生活的主要制约因素，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显示中国已经把注意力转向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拓展发展的深度上来，以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社会。这个重点工作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概念，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实践表明，中国已把国家发展规划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紧密结合起来。“十三五”规划第53章明确提出，中国将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此，外交部发布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国务院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以及《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年8月份中国发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进展报告》显示，自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效以来，中国在短短两年内已取得长足进展。

中国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与担当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在推动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表明，中国不仅在国内推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其他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不断扩大的南南合作中，中国已经为支持全球减贫、应对气候变化、改善教育和健康作出更大贡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实现合作与经验共享，特别是在减贫、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增长等领域。“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一个具有区域内特征且覆盖广泛的创新发展框架，它可以在地区和国家两个层面作为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加速器，成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补充。中国还呼吁建立开放型经济和多边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在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卫生、维和、全球经济治理、能源安全以及重塑多边机制等方面积极工作，中国政府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重视，显示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不单纯依靠经济驱动，而是更加侧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共同繁荣。联合国已做好准备，支持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未来联合国驻华机构在中国的工作重点

首先是继续打好减贫和精准扶贫攻坚战。毫无疑问，几十年来中国在摆脱贫困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然而，和许多国家一样，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面临发展不平衡问题。完成全面脱贫的最后一公里路程将是中国的首选工作。这不仅要求确保

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而且要防止返贫。

再者，要在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确保经济增长不仅让高收入人群受益，而且能确保低收入人群也受益。从历史上看，所有经济体的转型都涉及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转移。然而，自动化可能使依靠劳动密集型经济创造就业的机会变得更加困难。

技术变革，特别是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面，能够实现工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服务的升级提供诸多选择，比如即将出现的无人驾驶汽车，餐馆和商店越来越多地通过触摸屏进行点菜下单，而由于在线购物的发展，零售中心正渐渐消失。这一系列变革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人跟不上发展的步伐。为了帮助这部分人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贫困不仅仅反映在收入水平上，而要以多维度的视角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受教育机会、家庭生活状况。

综上所述，我想就中国如何帮助落后群体和实现《2030年议程》提出三个主要建议。

第一，加强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对于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践行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新发展理念至关重要。这可以确保最后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数位于地理条件恶劣的偏远地区，真正融入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进程，并获得重要的政府服务，如基础设施、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

第二，加强社会保障制度，防止返贫。如今中国和在许多国家一样，一场重大疾病可以让一个家庭深陷贫困。作为高收入国家，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金、工伤保险等都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议题。

第三，持续跟踪落实进展，这对于有效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有利于确保资源集中利用在需求最大的领域。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为全球扶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影响力也正超越地域边界，正在塑造地区和全球格局。这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其发展方式不仅要对本国人民负责，还要对世界有所贡献。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负责任的行为者，并愿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来实现这一愿景。

（作者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外国学者看中国共产党

（上接1版头条）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根本原因就是敢于以创新谋发展。比如，深圳充分运用特区立法权，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为深圳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可靠法治保障。海南要以深圳为标杆，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努力把改革创新的各项事业推向新高度、实现新跨越。

始终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面对新时代的新使命新要求，惟有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才能在新的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尤其需要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现在科技信息高速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新业态、新事物层出不穷，好奇心和求知欲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就会对新事物非常敏锐，主动学习、刻苦钻研，接纳新事物、追赶新事物、扶持新事物，于是知识越来越丰富，思维越来越活跃，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就越来越灵活。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创新思维，充满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他多次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创新与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要求我们在创新实践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将问题作为推动创新的契机，将创新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创造性成果。

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善于用创新思维发现问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无处不存，问题无处不在。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问题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有的显而易见，有的深藏于

复杂的表象之中，有的还可能通过别的形式反映出来，只有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增强洞察问题的敏锐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很多重大发明创造，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伽利略从“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现象中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学说的问题，进而提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安徽小岗村创造出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因为他们发现在大锅饭体制下，无法解决粮食产量低下、农民吃不饱饭等严重问题而倒逼出来的。

发现问题只是起点，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问题之所以称其为问题，是因为它不会自动消失，你不去解决它，它永远是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创新办法、敢于出招。工作实践中，党员干部更要学会运用创新思维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扶贫工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扶贫就是简单地给贫困户送鸭苗、鸡苗、鹅苗、猪苗之类，送了之后很多贫困户由于缺乏技术难以养活，这种方法自然难以奏效。后来扶贫干部转变思维，不再直接把苗种给贫困户，而是通过合作社或者引入专业公司入股的方式来经营，让贫困户拿分红，效果就比较明显。这就是创新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

“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

崇尚创新，国家才有光明前景，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就像生命成长需要充分的阳光、水和空气一样，创新尤其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持续滋养和“给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真正“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对各级党委政府来说，要着力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鼓励大胆创新。大力宣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创新理念，培养积极向上的创新价值观，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要有创新思路、创新举措，不管见没见成效，都应热情鼓励、精心呵护、积极支持，而不能漠视、观望甚至反对。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注重选拔奋有为、善于创新、敢于担当、依法办事的干部，重用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和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为干部大胆创新探索撑腰鼓劲。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监督模式，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更多地为各类创新主体松绑减负、清障搭台。

宽容创新失误。创新与失误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创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经验，难免出现失误甚至失败；另一方面，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失败又为创新不断积累经验教训，最终促成创新成功。事实上，许多新发明、新创造、新事物，都是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才取得成功的。我们要正确对待创新过程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区分开”的要求，着力培育和增厚宽容的土壤，为敢想敢干、敢于创新的干部解决后顾之忧，真正做到支持改革者、鼓励创新者、善待挫折者、宽容失败者、保护干事者。

保护创新成果。一个创新主体不断扩大、创新意愿不断增强、创新举措不断涌现的社会，必定是创新成果受到尊重、受到保护的社会。创新成果来之不易，凝聚着创新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需要全社会倍加珍惜、保护和转化利用。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在创新成果保护和应用的制度建设上应大胆探索，进一步健全和严格执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加快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建设，扶持创新成果服务机构建设，加大对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的支持力度，推进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运营，更好地凝聚和激发创新者在海南进行创新实践、应用创新成果、增加创新获得。

（作者系海南省委副书记）

经济学中有外部性问题，这个概念可以引入国际关系。所谓国际关系中的外部性问题，就是指影响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非相关国自身的因素。拿双边关系来说，决定双边关系的主要是内部因素，即两国的相互战略与政策；然而，在现实中，双边关系往往受一些本国左右不了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就是外部性问题。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的相互战略与政策无疑是决定双边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但是一些外部因素如朝鲜半岛问题时常成为中美之间的议题，引起中美之间的斗争或合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以及朝核问题都不是中美两国的事情，中美对该地区虽然都有很大影响力，但是不可能代替半岛两国制定政策。对中美双边关系来说，朝鲜半岛就是一个外部性问题。当然，如果考察中国同朝鲜半岛关系或美国同朝鲜半岛关系，那么美国和中国就分别成了另外两方关系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也存在于多边关系中。以中日韩关系为例，本来三国经贸合作势头很好，有望早日达成三边自贸协定，然而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日韩两国拉进去，使两国对达成中日韩自贸协定的动力大减。更大范围的多边关系也会有外部性问题。比如西方七国集团，可算是七个西方大国的多边合作机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明显地受到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影响，其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急速下降。对西方七国之间的关系来说，新兴国家就是其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有时是十分重要的。近70年前，中美在朝鲜半岛打了一仗，导致两国对抗20多年。过后美国人总结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仗”。当然，相比较而言，大国由于实力强，自主自控能力也强，因此受外部性问题影响相对弱一些；而对小国来说，周边大国与世界大国肯定是重要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性问题对小国之间关系的影响明显地要大得多。

国际关系中的外部性问题也存在着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那些使相关各方都受损的外部性问题就是负的，反之，使相关各方都受益的外部性问题就是正的。还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在朝鲜战争中都遭受损失，可以说那时朝鲜半岛问题就是负外部性的。冷战后期，中美联手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促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这时的苏联就是一个正外部性问题。

正负两种外部性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符合矛盾转化的哲学原理。正负外部性本来是对立着的，但是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可以互相转化。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这种转化创造条件。对中美关系来说，苏联就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性问题，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它是负外部的；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同时

（上接1版三条）

有利于农业资源流转，为深化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创造条件

农村改革四十年来，农村土地制度经营制度经历了由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统一，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再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重大变革。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这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创新，实现了土地承包“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为深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实现土地资源流转，解决农民承包权的“稳”与经营权的“活”创造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这为深化“三权”分置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探索“三权”分置多种实现形式。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既存在整体效用，又有各自功能，要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权益，从当前实际出发，实施“三权”分置的重点是放活经营权，核心要义就是明晰赋予经营权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能，激活经营权，促进农村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推动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发展。

确保土地承包关系长久稳定，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改革，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为统筹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民问题找到了新路径。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国情，人多主要是农民多，这决定了小农户将长期存在。“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在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的同时，不能造成大量农民失地失业，成为农村贫民或城市贫民。不能解决了农业问题，恶化了农民问题，要把农业、农民问题放在一起统筹考虑。通过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确实权、颁铁证”，农户拥有稳定的承包权，可以进退有据，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通过

国际关系中的外部性问题

□ 刘建飞

美国也改变了对华战略，使苏联成了中美关系中的正外部性问题。

如果从国际关系总体状况来考察，将某国作为一方，其他国家各国作为另一方，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总体国际关系的外部性问题。有些国家自身治理良好，又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就是为国际关系提供正外部性；有些国家治理不善，成为诱发别国之间冲突的因子，就是为世界提供负外部性；而有些国家对外大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还有的国家大搞极端民族主义，造成别国缺少安全感，甚至使一些地区不得安宁，其对国际关系的负外部性就更为严重了。中国倡导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促进国际关系的进化，这无疑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正外部性。而中国自身发展、治理取得成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更是为国际关系提供了巨大正外部性。曾几何时，列强们为争夺在中国利益而恶斗不止，甚至在中国境内大打出手；而如今，中国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中坚力量。

外部性问题何时出现，从哪里来，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当事国难以把控的。对战略家和智库来说，能做而且也应该做的是未雨绸缪，审时度势，早做预案。如果出现了外部性问题，首先应当判断清楚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如果是正的，就应当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其功效；如果是负的，就应当尽量管控局势，使其带来的危害降到最小程度，同时努力促使其转化。

经营权出租、入股、托管等，农户可以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益。同时，放活了土地经营权，土地向种田能手、种养大户集中，小规模分散经营在减少，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发展，日益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引领力量。因此，“三权”分置改革为解决农业农民“两道题目”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形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的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载体，这就要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坚定农业投资者的信心。从而为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奠定了基础。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承包地再延长三十年，让农民深耕农业更放心。不论是土地流转，还是合作经营，只有稳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才能稳住民心，充分激发农民群众的创造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承包地再延长三十年，让新型经营主体更有信心。现实中，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兴起。他们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商品性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新型主体有了稳定预期，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基础设施投入，才能激发对农业农村发展的科技、资金上的长期投入，更好地实现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为现代农业提供不竭动力。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激发活力，形成合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